

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七册

建国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第十七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1)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 附件一：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39)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 附件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
会谈上的声明 (42)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 附件三：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
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45)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47)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
的通知 (65)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 (68)

-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78)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 (114)
(一九六三年九月)
奋发图强, 勤俭建国 (116)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
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决定 (124)
(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力争超额完成一九六三
年度棉花收购任务的指示 (129)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棉花生产工作的决定 (133)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 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交通
企业设置总会计师的几项规定(草案) (137)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国务院批转试行)
-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谭震林、聂荣臻《关于
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 (142)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
纪要》的指示 (237)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商业各部门 财务和管理工作的决定.....	(263)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267)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 当前市场方面资本主义势力活动情况和加强 旺季市场管理的报告》.....	(293)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周 扬 (300)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发明奖励条例.....	(315)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国务院发布施行)	
技术改进奖励条例.....	(320)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国务院发布施行)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325)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计执行 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 的报告.....	李先念 (357)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383)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监督
工作的指示..... (413)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二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批示..... (418)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过渡计划和长远规划..... 周恩来 (440)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日)
比学赶帮，齐争上游..... (446)
- 论各地工业企业之间比先进、学先
进、赶先进、帮后进运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451)
-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
骄傲自满的指示..... (487)
- 批转湖南省委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 毛泽东 (490)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在春耕前普遍讲解一次
两个文件的指示..... (49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已经一个多月了。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

现在，莫斯科、华盛顿、新德里、贝尔格莱德打得火热，苏联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攻击中国的各种奇谈怪论。苏共领导公然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公然撕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公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美帝国主义，联合印度反动派，联合铁托集团，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经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篇文章中，曾经概括地论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们对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事实，特别是涉及苏共领导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识地作了保留，给苏共领导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说明真相，弄清是非。现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问题上，扯了许多谎话，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来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一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

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错误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

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错误论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继续有效的问题，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说。

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脑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说，“在美国主张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还继续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说，帝国主义者

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破产，他们中间“出现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及其首脑可以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放弃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错误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路线。

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属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和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绝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就武断地作出结论，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颠覆他们的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错误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

央的公开信却硬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说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我们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是“虚伪”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的谈话，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苏共领导人的谈话，都一再谈到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分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内

部谈话中，也提出过我们的不同意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同苏共同志的多次内部谈话中，还针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们考虑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利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团结对敌，为了照顾苏共领导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苏共领导那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们没有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热忱，还希望苏共领导能够改正错误。因此，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场合给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则上阐明了我们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场。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同志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所谓“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盘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详细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并且说明了我们党一贯的正确作风，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错误。

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不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有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态度吗？

怎么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种一贯的、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摇摆不定”的、“虚伪”的，是什么“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指责，大概是他们以为，我们过去的批评只有苏共少数领导人知道，可以赖账，可以用谎言来欺骗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但是，这种做法，不是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虚伪的吗！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恶果

苏共中央公开信极力吹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出色的结果”、“伟大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只要是不健忘的人，总会记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没有带来什么“出色的结果”或是“伟大的结果”，而是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当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气焰高涨，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当时，铁托集团嚣张万分。他们打着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口号，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叫嚷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在南斯拉夫开始的“新趋势”“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

当时，处于绝境的共产主义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跃起来。所谓第四国际在他们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叫嚷

说：“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起来。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一批叛徒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起，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苏共领导对这两个事件都曾经犯了严重错误。苏共领导调动了军队，企图用武力压服波兰同志，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共领导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布达佩斯的紧急关头，曾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

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使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猖狂起来，给许多兄弟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着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同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起，坚决主张击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进攻，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我们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坚决反对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我们坚决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问题，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同时，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维护了苏共的威信。

当时，苏共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